

反动的“启蒙读物” 必须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

反动的“启蒙读物” 必须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

反动的“启蒙读物”必须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54,000字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68 定价：4.44元

毛 主 席 语 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目 录

反动的“启蒙读物”必须批判	秦华 晓钟 (1)
《三字经》批注	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三字经》批注小组
《千字文》批注	北京工艺美术工厂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千字文》批注小组 (49)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改良女儿经》批注选	北京化工工厂工会女工委委员会 (10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师生《改良女儿经》批注小组
《国学千字文》批注选	北京市木材厂工人理论小组 (131)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大批判组
《神童诗》批注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神童诗》批注组 (153)
《名贤集》批注选	顺义县天竺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小组 (18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师生《名贤集》批注小组
《弟子规》批注	北京新华印刷厂四印车间理论小组 (20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批判《弟子规》小组

反动的“启蒙读物”必须批判

春 华 晚 钟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逐步走向保守和反动，在文化教育阵地上，少年儿童的“启蒙读物”也愈来愈反动。

西汉前期和中期，地主阶级还处于生气勃勃的上升阶段，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思想，所以，当时流行的一些蒙学课本大都是以介绍自然、技术知识与生活常识为主，孔孟之道的气味并不浓。以后，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封建统治者由尊法反儒转而走向尊儒反法，在文化教育领域内这种情况也就逐步改变了。到了南北朝、隋唐，就出现了象《千字文》、《蒙求》、《太公家教》等宣扬忠孝仁爱、中庸之道的小册子。到了宋朝，土地兼并更加剧烈，广大农民日益破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地主阶级越来越走向反动和没落。反动统治阶级除了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外，迫切需要加强对人民的精神束缚和摧残，更加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样，《三字经》一类宣扬孔孟之道的“启蒙读物”也就相继出笼了。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更深

地陷入了政治与思想统治的危机，反映在文化教育阵地上则是变本加厉地尊孔崇儒。一些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小册子也似乎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不断地把《三字经》、《女儿经》一类的东西增订、再版，并详加插图和注释，大量刊行，规定为儿童必读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字经》一书，就有《三字经注》、《三字经训诂》、《绘图评注三字经》等二、三十种版本，并出版了蒙文和满文等兄弟民族文字版本，甚至译成了外文。《名贤集》、《弟子规》、《改良女儿经》、《幼学琼林》、《童蒙必读书》之类的“启蒙课本”也接二连三地被抛了出来。这些小册子的共同特点是宣扬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等一套没落地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才论”和“学而优则仕”一套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思想。

没落地主阶级这样不遗余力地搞这些“启蒙读物”，首先是为了培养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强化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那些官僚贵族、地主豪绅声称，“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王筠：《教童子法》），就是说，他们要用孔孟之道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圣贤和豪绅，成为善于鱼肉人民、压榨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同时，他们也要利用这些孔学课本，愚弄和麻醉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思想俘虏是越多越好。他们说：“得天下多一好人，即为天下少一恶人。况一人为善更可感化数十百人”（《教会新报 97 卷·小学义理纲条》）。这个短短的自供，赤裸裸地道出了没落地主阶级利用文化教育培养奴才、争取“顺民”、镇压革命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看看大剑

子手曾国藩的死党罗泽南的行径就更清楚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爆发后，这个聚徒讲学，自称所谓“一介书生”（罗泽南：《小学韵语》）的家伙，立即纠集其反动门生破门而出，大打出手，疯狂屠杀农民革命军。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所谓“军务倥偬之余”（同上），又和他的门生一道，把朱熹的反动小册子《小学》改编成四言一句、便于朗读的《小学韵语》。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正天下之学术”，因为“学术正则祸乱有不难削平者”（同上）。在挥舞屠刀的同时，还利用文化教育，“正学术”，“正人心”，妄图扼杀革命，“削平祸乱”，这正是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的反革命策略！

在阶级社会中，少年儿童教育的争夺战是十分激烈的。没落地主阶级通过长期的地主阶级专政，积累了反动教育的经验。研究他们这一套，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

他们说：“人之幼也，知愚未有所主”（《小学集解·小学总论》），所以“养人之初，首重发蒙”（罗泽南：《小学韵语》），而“童子知识初开，先人之言为主”（《童蒙必读书·小引》）。就是说，少年儿童思想不定型，可塑性很强，很容易接受各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必须十分重视启蒙教育，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抢先占领这块阵地。程朱理学的祖师爷——程颐、程颢说，人的头脑好比空瓶子、空罐子，你把它灌满了水之后，“虽江海之浸无所能入”（《程书》卷十五）。他们以为，少年儿童头脑里塞满了孔孟之道之后，就再也不会受劳动人民造反思潮的影响了。他们又把对人的教育比作驯牛，鼓吹必须趁它小时及早制服它。他们说：“教人之术，若童牛之牿，当其未能触时，已先制之”（《程书》卷二上）。他们这样费尽心机地利用少年儿童的年幼无知和

缺乏抵抗力以售其奸，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加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以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们除了拼命向少年儿童灌输孔孟之道以外，还要训练儿童所谓“修养”的习惯。他们说，人的思想“易于放逸”（《童蒙必读书·吴氏教铭》），必须让学生尽量克制自己，约束自己，“收敛方寸”（同上），从人一睁开眼睛，有思想活动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进行“修养”（《童蒙必读书·陈氏夙兴夜寐策》），必须以“格言至论”，让儿童“盈耳充腹”（罗泽南：《小学韵语》）。翻一翻《弟子规》、《改良女儿经》那一套小册子，正是这样。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天明到天黑，从政治到吃饭，从走路到说话、哭笑，都给定出规矩来了。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东西是“毒害小儿的药饵”、“陷没将来的阴谋”。他们要按照早已铸就的模子，把少年儿童一个个弄成“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以致“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的恭顺的奴才。

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没落地主阶级的血腥镇压，包括它们精心设计的少年儿童教育方案，都无法阻止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无法阻止从本阶级的营垒中杀出逆子贰臣来。这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在。太平天国革命和太平天国的《三字经》、《御制千字诏》、《幼学诗》，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文化教育战线上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早在新中国诞生以前，毛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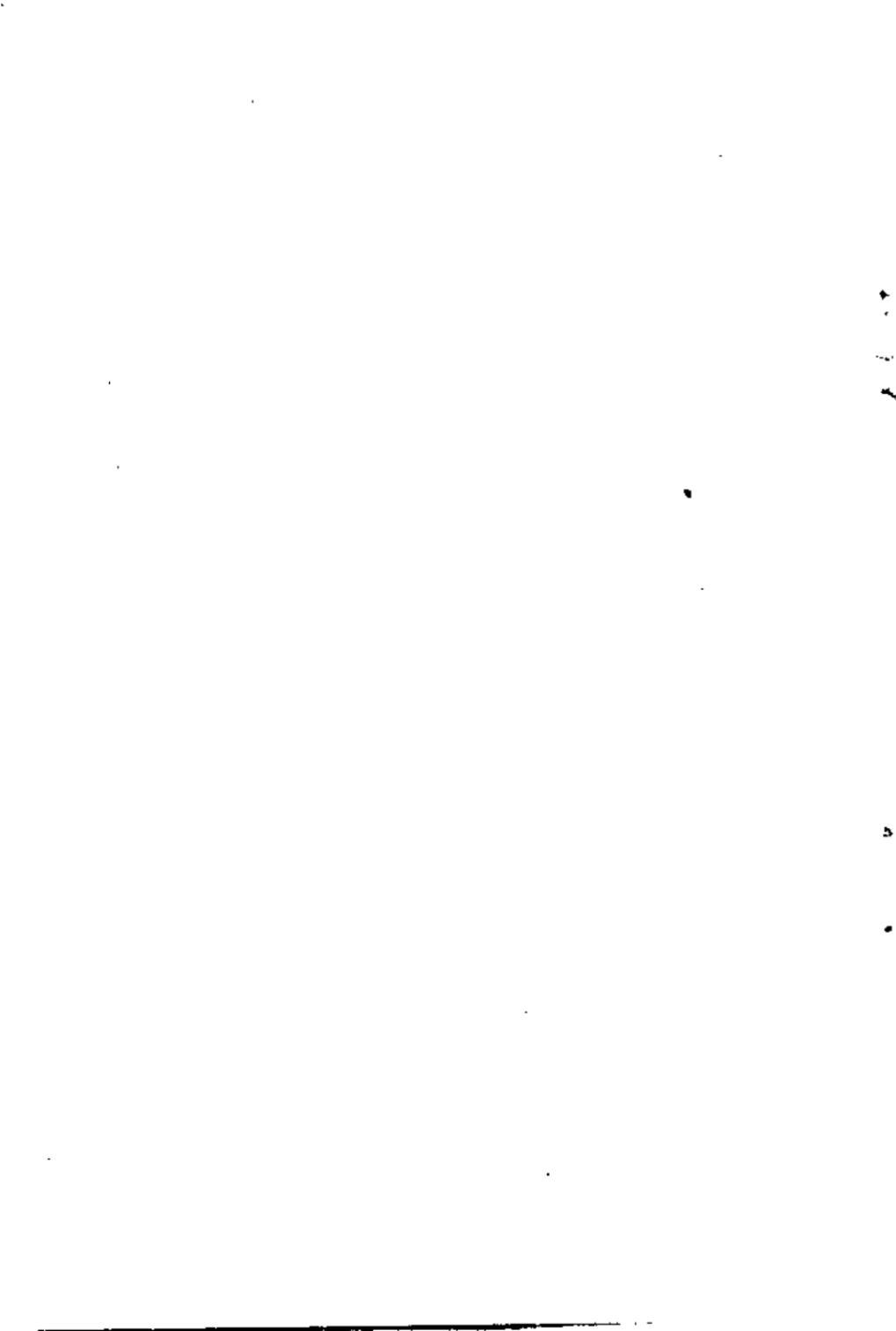
就明确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又给青少年题词，勉励全国青少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育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写信热烈支持红卫兵小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并教育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刘少奇、林彪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适应国际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完全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不遗余力地贩卖孔孟之道，千方百计地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拼命反对教育制度的改革，竭力推行浸透着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六十年代，刘少奇之流又跳出来为《三字经》鸣冤叫屈，鼓吹“《三字经》是本好书，可惜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没有人去理会它了”，无耻地吹捧《三字经》是几百年来的“儿童启蒙的必读书”，“发生了深远的广泛的影响”，是“百科全书”，要“蒙以养正”。他们在“接受传统教材”的幌子下，在小学教育中竭力推销《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孟子》等黑货。要求教师要无批判地咬文嚼字地教，学生要无批判地滚瓜烂熟地背。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声嘶力竭地叫嚷：“小学生也要熟读《孟子》”。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广为搜罗孔孟之道的黑货，教子尊孔读经，鼓吹孔老二的“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他们大肆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地主资产阶

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青少年向工农兵学习和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从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地主、资产阶级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从来是不择手段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浸透着没落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的儿童读物，去毒害青少年，争夺思想阵地，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千百年来沉积在各个角落里的孔孟之道的垃圾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三字经》、《神童诗》、《女儿经》这一类反动的“启蒙读物”，正在被扫除。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少年儿童读物正在大量涌现。从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到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纷纷冲上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利用批判会、故事会、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口诛笔伐，向封、资、修的黑货猛烈开火，生动有力地狠批林彪、孔老二。他们在自己编写的革命儿歌中写道：“《神童诗》，害儿童，宣扬闭门读孔孟。什么‘满朝朱紫贵’，什么‘尽是读书人’，全是读书做官的‘理’，全是欺骗人民的‘经’。拿起扫帚扫灰尘，拿起铁笔批孔孟。我们红小兵，读书为革命，有觉悟，有文化，长大要当工农兵。”这些洋溢着革命精神的豪言壮语，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正在成长。然而斗争还刚刚开始。我们决不可低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斗争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在教育阵地上的影响年

深日久，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那些老奸巨猾的政治“教唆犯”仍在编造坏儿歌，或者利用坏书之类，继续散布孔孟之道，腐蚀和毒害青少年。我们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特别注意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抓紧对青少年的革命教育。必须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断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反动的“启蒙读物”，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为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读物，占领青少年教育阵地，教育广大青少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他们从小就能粗知一些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判孔老二，敢于反潮流，自觉地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三字经》批注

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三字经》批注小组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末年反动儒生王应麟（字伯厚，公元一二二三年至一二九六年）所编写”。《三字经》在南宋时期出笼不是偶然的，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经进入后期，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大官僚地主阶级，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剧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同时，对于我国北方女真贵族所建立的金朝的进攻，南宋反动统治者采取投降主义，向金朝进贡称臣。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北宋末到南宋时期，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钟相、杨么等多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他们“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沉重地打击了南宋

* 还有一种说法，《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末区（音歌）适子。

王朝的封建统治。

在这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改革家，从北宋的王安石到南宋的陈亮等，主张革新，主张前进，反对民族投降。他们在和大地主阶级的复古派、投降派进行斗争时，对孔孟之道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动统治阶级尊儒反法气焰十分嚣张。到了南宋，官僚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在残酷镇压农民革命的同时，大力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把继承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他们拼命抬高孔老二，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宣布“三纲五常”为不可抗拒的“天理”，把劳动人民造地主阶级反的革命行动和法家主张革新的进步思想，统统诬蔑为“万恶”的“人欲”。他们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和“尊王贱霸”的尊儒反法的反动观点。南宋封建统治阶级在使用反革命暴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大量注释儒家“经典”，还千方百计地用通俗的形式来宣扬孔孟之道。反动的《三字经》就是适应地主阶级的这种政治需要而出笼的。

《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为反动统治阶级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所以一出笼就受到南宋王朝的重视。明清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孔孟之徒对这本书都大加吹捧，说什么，《三字经》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和“小型百科全书”，不断修订、增补和注释，并大量翻印。除汉文外，还有蒙汉文、满汉文的对照版本。帝国主义分子把侵华和尊孔结合起来

来，把《三字经》吹捧为“中国教育的基石”，并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等。蒋介石反动集团把《三字经》重新修订，广为散播，为其反动统治服务。

解放以后，刘少奇、林彪之流，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搞尊孔读经，重新出版《三字经》，“三家村”黑店大肆吹捧“《三字经》是一本好书”，哀叹“可惜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并叫嚣要继承这份“遗产”。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伙反动家伙妄图开历史倒车的狼子野心。

《三字经》被阶级敌人吹捧了七百多年，现在是对其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了。我们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三字经》之类的坏书进行彻底批判，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原文] 人之初，性本善^①。性相近，习相远^②。
苟不教^③，性乃迁^④。教之道^⑤，贵以专。

[注释]

① 性：本性。“性本善”这个反动观点，出自《孟子·告子上》，“人无有不善。”“善”，这里指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鼓吹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它们认为这种道德观念是先天就有的。

② 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阳货》。习：习惯。

③ 苟：如果。

④ 乃：就。迁：迁移，变迁。

⑤ 道：道路，方法。

[大意]

人一生下来，本性都是“善”的。人和人之间的“善性”都是相近的，由于沾染“恶习”，才相距远了。如果不教育，人的本性就要变坏。因此，教育的道路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专一于孔孟之道。

[批判]

《三字经》一开头就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人性论，作为地主阶级政治路线和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胡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直接贩卖孔丘和孟轲“性善论”的黑货。

所谓“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人的阶级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三字经》在这里故意把地主阶级的吃人的本性，美化成“善性”，并把地主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其罪恶目的，就是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欺骗广大劳动人民。

对于地主阶级的“善性”，我们工人阶级早就领教够了。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善性”所给予我们的就是杨白劳和喜儿的悲惨遭遇，就是那数不尽的万人坑……。解放前，北京通县有个姓白的地主，他用向穷人施舍发了霉的绿豆汤的手段，给自己捞取了一个“白善人”的美名。可是，一次给他放羊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小心丢了一只羊，这个“白善人”马上就露出了吃人的凶相，他亲手用皮鞭把这个孩子活活打死，并把尸体埋在他的窝瓜地里，恶狠狠地说：“不能让你白吃我这么多年的饭，